

引用格式：

詹舒雅, 胡志全, 杨敬华. 资本下乡中的农户合作偏好——基于选择实验法的研究 [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5, 46(2): 328-338.

ZHAN S Y, HU Z Q, YANG J H. Farmers' preferences for cooperation in rural capital investment: a study based on choice experiments[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25, 46(2): 328-338.

DOI: 10.13872/j.1000-0275.2024.1880

CSTR: 32240.14.1000.0275.2024.1880



资本下乡中的农户合作偏好 ——基于选择实验法的研究

詹舒雅, 胡志全*, 杨敬华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北京 100081)

摘要: 资本下乡在城乡融合发展中的作用虽备受争议, 但其优势不可忽视。了解农户与工商资本的合作偏好, 为有效发挥工商资本联农带农效应、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本文采用选择实验法, 基于安徽阜南和江苏溧阳的农户调查数据, 运用 AGIL 模型和混合 Logit 模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 农户对与工商资本的合作持积极态度。在供给主体选择上, 农户偏好“能人返乡” > “外来企业”; 在合作模式上, 农户更倾向于“公司+村集体+农户” > “公司+农户” > “公司+合作社+农户”; 在利益联结机制方面, 农户的选择偏好依次为“务工参与” > “随行就市” > “合同契约”。与预期不符的是, 农户对服务类型的偏好差异较小。根据研究结果, 建议重视农民在资本下乡项目合作模式中的主体地位, 鼓励探索复合型利益联结机制, 支持外出能人回乡投资, 同时提升村集体组织的参与能力。此外, 工商资本应积极融入乡村社会关系网络, 参与乡村公共物品的供给。

关键词: 资本下乡; 选择实验法; 农户合作行为; Logit 模型; AGIL 模型

中图分类号: F321.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275 (2025) 02-0328-11

Farmers' preferences for cooperation in rural capital investment: a study based on choice experiments

ZHAN Shuya, HU Zhiquan, YANG Jinghua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e trend of capital flowing into rural areas has been a topic of debate, but its advantageous role i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cannot be overlooked. Understanding farmers' preferences for cooperating with industrial capital provides essential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effectively leveraging the linkage effect of commercial capital in rural development and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This study uses choice experiments and survey data from farmers in Funan, Anhui, and Liyang, Jiangsu, and analyzes the data using the AGIL model and the mixed Logit model.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farmers have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cooperation with industrial capital. Specifically, regarding the supply side, farmers prefer “talented individuals returning home” > “outside enterprises”; for cooperation models, farmers' preferences are ranked as “company + village collective + farmer” > “company + farmer” > “company + cooperative + farmer”; in terms of interest linkage mechanisms, farmers prefer “labor participation” > “market-driven” > “contractual agreement”. Contrary to expectations, farmers showed little variation in their preferences for service type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farmers' principal role in cooperation models for capital investment projects in rural areas should be emphasized. It advocat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faceted interest linkage mechanisms and the encouragement of capable individuals who have moved away to return and invest locally. Moreover, enhancing the participatory capacity of village collective organizations is critical.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apital should also actively integrate into rural social networks and contribute to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in rural areas.

Keywords: rural capital investment; choice experimental; farmer cooperation behavior; logit model; AGIL model

收稿日期 Received: 2024-11-04; 接受日期 Accepted: 2025-02-01

基金项目: 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项目 (ASTIP-IADE-2024-02)。Supported by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roject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ASTIP-IADE-2024-02).

* 通信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 (huzhiquan@caas.cn)

当前我国城乡发展不协调的矛盾依然较为突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作为城乡要素流通的重要手段之一，工商资本下乡自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以来，就被鼓励用于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各类事业。在此后的十余年间，系列政策陆续出台，引导工商资本有序下乡。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明确强调了资本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的实际作用。在政策支持下，大量工商资本涌入农村，作为传统农村发展要素的重要补充，推动了农村经营形式的深刻变革。由此可见，工商资本下乡在一定程度上不仅解决了富余城市资本的“出路”问题，也为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一体化和城乡融合提供了重要可能。

在农村市场化发展的大趋势下，有学者认为，资本下乡能够为农村引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连接小农户与大市场，从而助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1-2]；同时，更多农户的参与也为农民组织化和再合作创造了机会^[3]。这些研究普遍强调了资本与农户利益一致的重要性。然而，在实践中，资本下乡却面临诸多困境。一方面，工商资本下乡存在合规问题，例如“非粮化非农化”现象对粮食安全造成冲击^[4]；部分资本甚至“毁约弃耕”或“跑路”，严重损害农户利益^[5]。此外，还暴露出一些企业套取国家补贴、违规流转土地等问题。例如西北某县部分资本大肆囤地炒地，造成土地租金飞涨等恶劣影响。另一方面，工商资本下乡也面临接纳问题。不少资本在考察或前期沟通中，遭遇群众的不欢迎、不理解和不信任，导致合作受阻^[6]，许多资本最终只能“到乡”而难以真正“下乡”，更遑论实现政策目标。这些问题使得资本下乡的积极效应未能在学界得到一致认可^[7-9]。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工商资本下乡面临政策需求大与现实发展难并存的“下乡”悖论，这一悖论深刻影响了农户在资本下乡过程中的心理认知和行为选择。如果农户与资本之间的长期互动无法顺利开展，不仅会制约农业产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壮大，还可能对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带来负面冲击，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并通过政策进行干预。这也正是本文的基本出发点。此外，大量文献探讨了工商资本通过政府助推、村企合作、社会网络、数字技术等手段嵌入乡土社会的实践过程^[10-13]，这表明以往农户更多是被动接受资本的进入，而非主动参与决策。忽视农民主体性往往导致乡村公共资源被资本

主导，成为其经营获利的工具^[14]。当前，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呈现出投资主体多元化、模式多样化、领域广泛化的态势。在这一背景下，农户面临更为多样且复杂的合作选择，如何表现其合作偏好和行为特征，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但相关讨论仍显不足。鉴于此，本文基于结构功能模型和随机效用理论，借助选择实验法模拟农户面临不同工商资本时的选择情景及合作意愿，对江苏溧阳、安徽阜南两地农户开展问卷实验调查，并且运用混合Logit模型测度农户选择偏好和异质性来源，以期破解工商资本“下乡”悖论，深化对资本下乡的理论认识，为推动农村改革、城乡融合以及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价值的政策参考。

1 理论分析

1.1 结构功能视角下的资本下乡

美国现代社会学奠基者塔尔科特·帕森斯认为，结构表现为一种功能，社会结构是由不同基本功能和多层面社会系统形成的总体^[15]。为了使系统自身得到维持和发展，任何社会系统都需要满足适应（Adaption）、目标达成（Goal gratification）、整合（Integration）及模式维护（Latency pattern maintenance）等功能（简称AGIL模型），以实现系统的自动稳定调节。

结构功能主义的AGIL模型为分析资本下乡提供了新的解释视角。一方面，AGIL模型中各功能的子系统共同构成社会整体系统，各子系统功能的释放会对系统整体功能产生影响^[16]。工商资本若要在乡村稳定持续地发展产业，必须具备适应乡土社会、实现资源整合等功能性条件，而这些条件的不同组合与互动必然会影响资本下乡的成效。另一方面，AGIL模型中四个功能与资本下乡的运行逻辑高度契合，能够有效解释资本下乡的运作过程。首先，确定由谁来提供相应资本是企业适应并嵌入乡土社会的前提条件，由企业向村庄提供各类资源；其次，村庄内部的各类公共资源要素属于集体所有，农民作为集体成员，资本若要使用这些资源，必须与农户达成一致，因此，与农户建立合作关系才能促使资本下乡目标的达成；另外，资本的逐利性和农户的收益观决定了利益联结机制是整合企业和农户的重要基础和条件；最后，相关服务保障是维护社会资本有序投入的关键，而模式维护功能则需通过服务保障机制来实现。

概而言之，基于AGIL模型提炼的资本下乡运行逻辑表明（图1），工商资本嵌入乡村需要一个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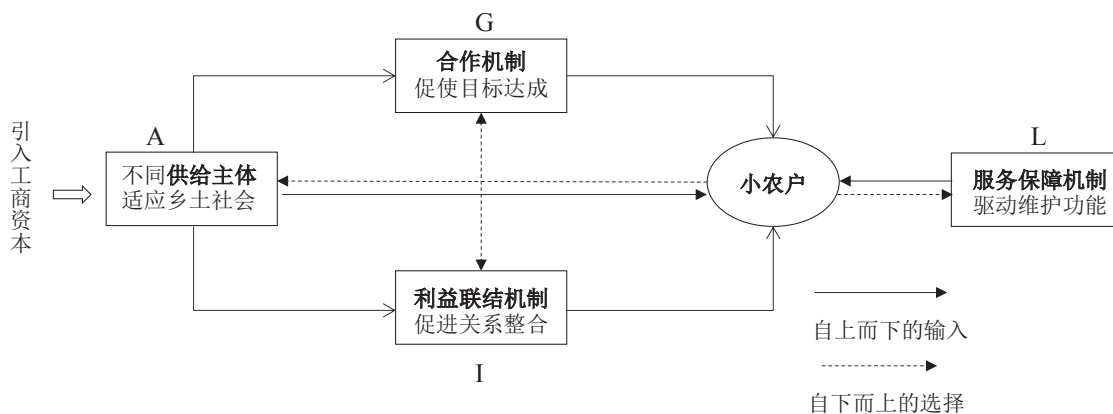


图 1 资本下乡运行逻辑的 AGIL 模型分析

Fig. 1 Analysis of AGIL model for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apitals investing in agriculture”

环节相互支持的整体系统。通过整合不同的供给主体、合作机制、利益联结机制和服务保障机制，能够强化资本下乡的功能输出及功能释放。

1.2 效用对农户合作行为的影响

在已有农民经济研究中，关于农户行为经济的理论主要由恰亚诺夫的“道义小农”、舒尔茨的“理性小农”和黄宗智的“综合小农”三种主导。农民在参与工商资本下乡过程中的行为具有经济合理性，其决策偏好通常受到个人利益或家庭福利考量的驱动，同时受到土地、劳动力等固有资源的现实约束。农民更倾向于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以实现最大获益，这本质上是一个效用最大化的问题。因此，本文在农民“理性人”假设的框架下展开分析。Lancaster^[17]的消费者选择理论认为，商品的效用来源于其属性，而非商品本身；随机效用理论则基于以下假设：每个人都是理性的决策者，会选择能够最大化其效用的选项。McFadden^[18]首次将随机效用理论应用于消费者选择行为研究，分析了消费者在面对多种选择时的决策行为表现，从而将选择行为的定性分析转变为效用比较的定量分析。

效用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分析农户合作（参与）行为的偏好。例如，张章朝等^[19]提出，只有充分尊重追求个人或家庭效用最大化的农民，农业生态保护政策才能取得预期效果；叶飞和王吉璞^[20]在研究公司与农户订单农业供应链合作模型时，验证了农户效用帕累托改进的 Nash 协商谈判机制；许恒周和郭忠兴^[21]发现，土地流转对不同阶层农民的效用具有分化性，是影响其行为选择的根本原因。上述大量研究为本文探讨资本下乡情境下的农民行为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下乡资本的生产经营行为需要各类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而当地农民因其在地化特性成为最合适的供给者^[22]。因此，农民作为资本下乡的主体和主要利益相关者，需要

不断深化对其合作意愿与诉求的理解，以提高工商资本投资的针对性，优化效用水平。通过持续优化和调适资本行为，能够保障工商资本与农户之间的良性互动。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选择实验法

本文采用选择实验法来研究农户的选择偏好，将复杂的工商资本下乡情境简化为实验环境。作为一种定量市场调研和行为经济学工具，选择实验法被广泛应用于评估个体或群体在面对一系列备选方案时的偏好和决策过程。其关键优势在于能够直接测量实验对象的偏好，甚至支付意愿，而这些在传统调查方法中往往难以获得。在农业经济领域，选择实验法被具体应用于农户行为选择偏好的研究，如农村生活垃圾处理^[23]、环保农资购买^[24]、契约签约行为^[25]等；同时也涉及休耕补偿^[26]、生态补偿^[27]等补偿方案设计。值得关注的是，韩喜艳等^[28]利用选择实验法调查了农户对参与农业全产业链的偏好，模拟了农户参与全产业链环节时所考虑的参与途径、利益联结机制、提供服务和政策扶持类型。

2.1.1 属性水平的设置 选择实验的关键步骤是确定属性和属性水平，研究者通过设计这些属性和属性水平来重点关注研究所讨论的因素。本文假定农户将在效用最大化的原则下，在假想情境中选择他们更偏好的合作方案。这些方案由不同的属性和属性水平按照一定的组合规律产生。正如 AGIL 模型所强调的，若其中某一功能要素发生变化，整个系统的稳定平衡会被打破。工商资本下乡的任何一个要素发生变化，必然会影响农户的选择意愿和心理偏好。因此，在资本下乡的研究中，测量农户选择偏好的属性基于 AGIL 模型得以确立为：供给主体、合作模式、利益联结和服务保障四个方面。进一步

地，需要细化每个属性的具体水平，以此模拟更为真实的选择情景。具体设置如下（表 1）。

表 1 农户参与资本下乡的各属性及水平描述
Table 1 Description of the attributes and levels of farmer participation in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enterprises investing in agriculture”

属性	水平	水平数量
供给主体	能人返乡、外来企业	2
合作模式	公司+农户、公司+村集体+农户、 公司+合作社+农户	3
利益联结	入股分红、随行就市、务工参与、合同约定	4
服务保障	风险防范、信息公开、纠纷调解	3

1) 供给主体属性及其水平设置。赵晓峰等^[29]基于资本属性和投资目的的不同，将下乡资本划分为外来资本和本地资本两种。因此，本文在供给主体属性水平的设置上，除较为普遍的外来企业外，还将具有本村成员身份的返乡能人确立为一个新的变量水平。

2) 合作模式属性及其水平设置。合作模式指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合作形式，包括参与主体及其关系。本文界定资本下乡存在以下三种复合型模式：“公司+农户”、“公司+村集体+农户”以及“公司+合作社+农户”。

3) 利益联结属性及其水平设置。利益联结是指资本下乡后，企业与农户之间形成的利益分配方式。综合现有关于资本下乡利益联结机制的研究^[30]，本文选取了入股分红、随行就市、务工参与和合同约定四种形式作为本文利益联结的属性水平。具体而言，随行就市建立的是相对自由松散的市场关系，农户通常分散经营，公司按照市场价格收购农产品；务工参与是指公司在一个或多个环节雇佣农民为劳动力，并向农民支付劳动报酬；合同约定主要包括销售契约、生产契约和土地（房屋）租赁契约；入股分红是指公司与农户合作经营，公司提供资金，农民提供土地或其他要素资源，收益按照股份比例进行分红。

4) 服务保障属性及其水平设置。服务保障的存在可以有效缓解资本下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负面效应。借鉴各地政府发布的社会资本下乡监管服务条例，并向相关领域专家进行咨询后，本文将服务保障设置为风险防范、信息公开和纠纷调解三个水平。

2.1.2 选择集设计 依据完全因子设计，各属性的各水平组合共计可产生 72 种选择（ $2 \times 3 \times 4 \times 3$ ）。若将这些选择进行两两配对组合，则会产生 2 556 个选择集，这在实际操作中并不现实。因此，本文采用 SAS 9.4 软件的正交实验功能设计了 8 个独立无关

的选择集，D-Efficiency 系数为 71.8。参照 Kuhfeld 等^[31]提出的最小化 D-Efficiency 系数标准，该数值表明设计的选择集具有较好的正交性和相关性。随后，将这 8 个选择集随机分配到两个版本的问卷中。每位农户随机抽取一个版本的问卷进行回答，每份问卷包含 4 个选择集，每个选择集包含 3 种选择方案。表 2 展示了选择集的示例。

表 2 选择集示例
Table 2 Example of choice set

属性	参与方式一	参与方式二	参与方式三
供给主体	外来企业	能人返乡	
合作模式	公司+农户	公司+合作社+农户	参与方式一和二均不选择
利益联结	随行就市	合同约定	
服务保障	风险防范	纠纷调解	

2.2 模型构建

选择实验法需要构建个体的效用函数。假设个体 i 对方案 j 产生的效用为 U_{ij} ， U_{ij} 由可观测部分 V_{ij} 和随机误差项 ε_{ij} 组成；其中， ε_{ij} 由影响选择的因素组成，具有不可观测的特性。具体如式（1）所示：

$$U_{ij} = V_{ij} + \varepsilon_{ij} \quad (1)$$

本文使用随机效用函数定义农户对于各类工商资本的选择偏好，假定农户会选择能给你带来最大效用的方案。此时，个体将从有限选择集合 C 中选择方案 j ，表示对于其他任意的方案 k ($k \neq j$)，都满足 $U_{ij} > U_{ik}$ 。在这一效用比较下，参与实验的农户 i 在面对全部选择集组合 C 时，会选择备选方案 j 而非备选方案 k ，选择的概率可以表示为 P_{ij} ：

$$P_{ij} = \text{prob}(U_{ij} > U_{ik}) \\ = \text{prob}(V_{ij} + \varepsilon_{ij} > V_{ik} + \varepsilon_{ik}, \forall k \neq j, j \in c, k \in c) \quad (2)$$

可观测部分 V_{ij} 源于合作方案的不同属性水平组合，可用简单的线性关系式来表示：

$$V_{ij} = \beta_i Z'_{ij} + \gamma_{ij} X'_i + \text{ASC} \quad (3)$$

式中： β_i 和 γ_{ij} 为待估计系数， β_i 表示农户 i 对某一可观测属性变量的偏好程度， Z'_{ij} 表示资本下乡的属性向量； γ_{ij} 表示农户个体特征对工商资本下乡选择偏好的影响程度， X'_i 则是农户个体特征向量。此外，引入 ASC 作为备择常数，用于表示资本下乡情景下的基准效用。ASC 的添加能够避免农户强行选择提出的改变方案，当农户 i 选择不作改变时，ASC 赋值为 0，反之为 1。此时，农户 i 选择方案 j 的概率服从 Logit 分布。

Logit 模型被广泛认为是研究离散选择的基本

工具,但传统的多项 Logit 模型假定不同决策者对实验属性的偏好是同质的,并且要求随机误差项服从严格的独立同分布(IID)假设。然而,混合 Logit 模型可以通过参数均值和标准差的分布来刻画个体的异质性,并且在操作上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因此,混合 Logit 模型更符合本文的研究目的。农户 i 选择方案 j 的概率可以表示为:

$$P_{ij} = \int \frac{\exp(\beta_i Z'_{ij} + \gamma_{ij} X'_i + ASC)}{\sum_{i=1}^I \exp(\beta_i Z'_{ij} + \gamma_{ij} X'_i + ASC)} f(a) da \quad (4)$$

然而,偏好可能是异质的,因此存在异质性的情况下,可以计算出对个体偏好的无偏估计。为了研究农户的异质性对工商资本选择偏好的影响,本文引入农户 i 的个体特征、家庭经营特征、风险偏好等变量 X'_i 与选择的属性变量 Z'_{ij} 的交互项,加入交互项的 U_{ij} 则可以简要表示为:

$$U_{ij} = \beta_i Z'_{ij} + \gamma_{ij} X'_i + ASC + \delta Z'_{ij} \times X'_i + \varepsilon_{ij} \quad (5)$$

式中: δ 为 Z'_{ij} 和 X'_i 的交互系数,如果 δ 与 γ_{ij} 符号相同(同为正数或同为负数)且显著,说明变量 X'_i 对农户参与资本下乡的选择偏好有正向作用,即变量增强了农户参与资本下乡某属性的选择偏好;如果 δ 与 γ_{ij} 符号相反(一正一负),则说明变量削弱了农户参与资本下乡某属性的选择偏好。其他变量含义与上式相同。

2.3 数据来源

本文调研地区选择江苏省常州市溧阳市和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样本抽取采用“乡镇-自然村-

农户”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在综合考虑各区(县)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比例等社会经济条件的基础上,选定了溧阳市的上黄镇、戴埠镇、天目湖镇、竹箦镇、上兴镇,以及阜南县的中岗镇、方集镇、赵集镇、会龙镇、鹿城镇共计 10 个乡镇进行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化访谈。每个乡镇选取 2 至 4 个自然村,共 27 个自然村,发放问卷 288 份,其中有效问卷 254 份,有效问卷率为 88.2%。

调查问卷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测量农户的个体特征、风险偏好及家庭经营特征,第二部分为选择集。其中,有关农户风险偏好对农民生产经营行为的影响已被诸多研究证实^[32-33],本文参照相关研究设计了 4 个观点问题让农户分别作答,每个问题按照风险从小到大分别赋分 1~4,最后将 4 个问题得分加总进行测量。分值区间为 4~16,总分越高农户风险偏好越强,反之越弱。样本的具体特征见表 3。

3 结果与分析

3.1 混合 Logit 模型回归分析

本文使用 Stata 15 进行回归分析。由于每位受访农户在选择实验中均需在 4 个选择集中进行选择,每个选择集包含三个选项,并且最终获得了 254 份有效农户问卷,因此共得到有效数据 3 048 条(254×4×3)。在实际应用中,混合 Logit 模型中的所有参数并非都能设置为随机参数,否则可能导致回归结果不稳定。常见的做法是将所有参数变量都设为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系数进行回归,并根据

表 3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Table 3 Variable descrip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释义	均值	标准差
个体特征变量	性别	受访者性别: 1=男; 2=女	1.44	0.50
	年龄/岁	受访者年龄	49.78	13.56
	受教育程度	赋值为: 1=未上学; 2=小学; 3=初中; 4=高中或中专; 5=大专及以上; 6=其他	3.32	1.24
	政治身份	受访者是否为党员或者村干部: 1=是; 2=否	1.74	0.44
	健康状况	赋值为: 1=良好; 2=一般; 3=较差	1.25	0.58
风险偏好测量	项目风险回报	在现实条件允许下,您会选择哪种产业项目? 1=确定获得 1 万元利润; 2=50%机会获得 5 万元利润; 3=25%机会获得 10 万元利润; 4=5%机会获得 20 万元利润。	7.93	3.27
	农业生产行为	假设您今年有 10 头牛待售,牛肉价格下降 20%,您如何处理? 1=卖 10 头; 2=卖 7 头; 3=卖 3 头; 4=等价格回升再卖。		
	投资借贷行为	是否愿意贷款或借款投资一个前景好的农业项目? 1=不愿意; 2=一般; 3=比较愿意; 4=非常愿意。		
	他人评价来源	亲友会用以下哪句话形容您? 1=从不冒险; 2=小心谨慎; 3=经仔细考虑,愿意承担风险; 4=喜欢冒险。		
家庭特征变量	家庭规模/(人/户)	家庭户籍人口数	3.99	1.81
	种植规模/hm ²	耕种总面积	1.658	80.20
	农业劳动力数(人/户)	家庭务农总人数	1.68	1.47
	农业劳动比重	务工人力数与家庭户籍人口数比值	0.43	0.36
	主要经济来源	赋值为: 1=农业经营; 2=非农就业; 3=资产收入; 4=转移性收入	1.78	0.76

变量的标准差系数显著性,重新将无统计学意义的参数设为固定参数变量,反复拟合直至所有随机参数变量的系数和标准差均显著^[34]。经过多次调试,最终确定将“ASC、能人返乡、务工参与、入股分红、合同契约”设为随机参数变量,其余设为固定参数变量,此时模型的拟合效果最优,且随机参数变量和固定参数变量的估计值最为显著。回归结果见表4。

随机参数的标准差系数可以有效刻画个体异质性。由表4结果可知,随机参数变量中的替代常数项ASC等五项标准差系数较大,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不同农户对工商资本的偏好存在异质性,具有随机性特征。相关异质性分析在3.2节具体展开。随机参数及固定参数均值系数则可以说明个体偏好程度。具体来看,ASC均值系数为正,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相比于不与工商资本合作,农户更偏向于与工商资本合作,农户认为与工商资本的合作能够提升其效用。此外,这还表明农户对于村庄引入社会资本并不排斥。在农民的认知中,企业所携带的资金和资源正是村庄发展的核心要素,这一发现进一步印证了小农户并非非理性和无效率的。在市场化的背景下,农户展现出自有的理性逻辑,经济理性已深入农民的内心^[35],农民可以通过这一逻辑提高家庭生计和农业生产中的要素使用效率。在证明本文设计的实验方案对大部分受访农户具有一定吸引力后,继续对各属性变量的偏好展开分析。

3.1.1 供给主体的偏好 以“外来企业”为参照,能人返乡的均值系数为正(0.809),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合正态分布(0.809, 1.144),这

表明对农户而言,当企业管理者是本村人时,与其合作的效用高于管理者为外地人的情况。

工商资本下乡面临一个重大问题——信任危机。一方面,农民通常更信任具有共同血缘关系或拟血缘关系的人。在熟人社会和关系社会的深刻影响下,农民更倾向于选择本村人作为企业老板,并在实际合作中展现出更为支持的行为态度。另一方面,乡村社会中的能人通常拥有更高的威望,且更加注重村民对其声誉的评价。因此,除了追求与外来资本共同发展和实现价值的现实目的外,返乡能人往往还怀有振兴家乡的独特情怀。这两个因素共同影响了能人返乡创业的环境氛围。例如,溧阳市XL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K总是黄岗岭村的返乡能人。自2006年起,他从承包荒地起步,发展成为年产值4000万元、涵盖超过600余hm²的“茶田+果园”生态园区,带动了大量当地农户就业。K总将成功经验归结为良好口碑的建立,除了开发生态产业园外,还积极参与村庄绿化、水泥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使农民在企业发展中切实受益。与此相反,调研中不少农户提到与外来投资者签订土地流转合同,但最终因老板违约跑路,未能兑现租金,且老板下落不明,导致合作关系完全破裂。

3.1.2 合作模式的偏好 以“公司+农户”作为参照水平,固定参数变量“公司+村集体+农户”的均值系数为正(0.351),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而“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均值系数为负(-0.401),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该结果表明,农户认为村集体介入的合作模式会增加其参与效用,而合作社参与的模式则相反。

合作社本应承担着为小规模农户提供市场进入

表4 混合Logit模型回归
Table 4 Mixlogit model regression results

变量类型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系数估计值	标准误	系数估计值	标准误
随机参数变量	替代常数 ASC	1.011***	0.318	2.956***	0.387
	能人返乡	0.809***	0.169	1.144**	0.343
	务工参与	0.548**	0.258	2.064***	0.422
	入股分红	-0.277	0.316	2.784***	0.505
	合同契约	-0.933***	0.268	1.297**	0.484
固定参数变量	公司+合作社+农户	-0.401**	0.149		
	公司+村集体+农户	0.351*	0.198		
	信息公开	0.060	0.186		
	纠纷调解	0.006	0.176		
	LR chi2(5)		272.01***		
	Log likelihood		-904.672		
	有效数据条数		3 048		

注:***、**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为避免多重共线性,供给主体中选定“外来企业”为参照,合作模式选定“公司+农户”为参照,利益联结机制选定“随行就市”为参照,服务保障选定“风险防范”选定为参照。下表同。

渠道的责任,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小农户参与市场化经营的最直接手段。然而,已有研究发现,“合作社+农户”合作模式多为“专业大户”参与,并未真正推动小农户生产^[36]。结合调研情况,部分农户反映当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由于管理不善,已名存实亡。他们感受不到合作社带来的实际效益,且对合作社的财务状况和组织制度不了解,也未曾行使过民主权利。因此,农户对“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的效用较低,原因在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际经营状况容易被农民察觉,“空壳”式的合作经济组织往往表现出较弱的发展能力,且集体决策成本过高,导致农民的合作积极性降低。相比之下,在“公司+农户”模式中,由于没有第三方介入,利润分红能够最大化地保留在合作双方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赋予农村集体组织法定职责,作为集体所有权的法定行使主体及村庄社会事务治理主体,村集体组织能够通过其资源整合优势、合作传统和组织优势解决农民合作中的主要组织成本问题。例如,溧阳市竹箦镇丁村由村集体牵头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发展餐饮、民宿和旅游,成功壮大了集体经济,2023年销售额达到1 018万元。该村集体通过集中连片整合农户土地,灵活配置村内资源,并交由有能力的企业统一建设和改造,这一过程中展现出的统一性和规划性恰恰符合资本下乡过程中企业所需的条件。

3.1.3 利益联结机制的偏好 在利益联结机制方面,以“随行就市”作为参照水平。随机参数变量“务工参与”在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均值系数为正(0.548),服从正态分布,表明农户认为该模式可以提高参与效用。相反,合同契约的效用较低,在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均值系数为负(-0.933)。总体来看,农户对于利益联结机制的偏好次序为:首先是“务工参与”,其次是“随行就市”,最后是“合同契约”;而入股分红则不显著。

对于许多小农而言,企业雇佣其劳动力具有诸多优势。农户在照顾家庭的同时,不仅能够获得工资收入,而且无须退出种植环节。调研中发现,农村务工工资有时并不低于城市的工资,且随着技术难度的提高,工资水平也有所上升。例如,溧阳市上黄镇X村某螃蟹养殖企业的技术养殖工月薪可达1万元,包装工月薪最低为3 000元。此外,资本化的规模农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老龄化农户或妇女提供的临时劳动力,这也产生了相应的雇佣需求。许多企业采用计件工资制,尤其在采收环节被广泛

使用,这种短期就业方式在农村老年人和妇女的生活保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简单的市场交易相比,随行就市作为一种纯粹的市场行为,减少了农户与企业之间的经济约束。尽管其形式简单,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产品滞销的问题,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此外,随着数字乡村建设的推进,电商企业的信息化资源为乡村注入了新的活力,“随行就市”也因此演变出新的形态。例如,溧阳的某电商企业采用预售模式,大大降低了农产品滞销的风险。

为了进一步厘清工商资本与农户建立契约的实际运行情况,本文以安徽QY种业开发有限公司与普通农户合作的商品粮订单种植为例:该公司提供优质小麦种子,农户负责种植管理,且需预付种子款3.6元/kg。收获后,公司以当地普通商品小麦市场价加价0.5~0.6元/kg回购符合质量标准的商品粮。与市场即时交易不同,合同契约通过规范化的购销合同形成了看似利润共享与风险分担的合作机制。然而,合同中有条款规定:“乙方需严格落实标准化的小麦种植管理,保证收获的小麦为合同约定的合格小麦,否则甲方有权拒收。”这一条款表明,企业在单方面规避风险,而农业种植的风险很大,且农产品质量受多重因素影响,因此在该合同中,农户依然处于弱势地位。

事实上,已有学者认为合同契约是否真正增加了农户福利仍存疑^[37]。部分农户对签订契约的合作方式并不积极,参与率低、订单违约率高;他们更倾向于非合同的销售渠道,更关心是否能真正成为合作的参与者^[38]。这些研究结果在本文的实证中得到了证实。从最简单的一次性市场交易,到形成一定劳务关系,再到签订正式契约合同和入股分红的过程中,农户与企业的利益关系、联结程度和风险性逐渐递增,同时也对农民的法律知识、理解能力和文化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尽管合同的签订能带来更强的稳定性与长期性,但“落袋为安”的心理依然是小农户参与农业经营的安全感来源,这也是他们在选择与企业利益联结方式时,更倾向于松散型而非紧密型合作的主要原因。

3.1.4 服务保障的偏好 与预期不符的是,服务类型属性变量的作用并不显著,农户对服务保障的偏好大致相同。向农户提供服务并未显著提高其效用水平。朋文欢和黄祖辉^[25]在研究种植户选择契约安排时也发现了类似现象。对此,本文的解释如下:一方面,对于大多数农户而言,尽管风险防范、信息公开和纠纷调解可以有效保障农民权益,但在实

际操作中, 这些措施常常难以及时落实到位。尤其是对于小农户而言, 由于风险规避心理的存在, 他们往往对企业老板产生近乎畏惧的情绪, 这与农民长期处于劣势地位、缺乏自我权益保障认知密切相关。另一方面, 在当前基层治理任务繁重、干部资源紧缺的情况下, 调解企业与群众的纠纷、及时公开信息等服务保障措施, 实际上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 这也带来了“谁来做”的根本问题。由于乡村治理能力的不足, 农民面临的合作风险难以有效消除, 这不利于资本下乡及村庄可持续发展的推进。

3.2 小农户参与偏好异质性来源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农户与资本下乡合作偏好的异质性来源, 本文对包含农户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变量交互项的模型进行了估计, 估计结果见表5。根据交互项系数的显著性及其正负性, 可以分析出农户个体及家庭特征对其参与偏好异质性的影响。结果表明, 替代常数ASC(是否与下乡资本合作)与农户是否为党员、是否为村干部、风险偏好、农业劳动力比率及家庭主要收入来源这四项的交互项显著, 而其他因素对农户合作偏好没有显著影响(因篇幅限制, 具体内容未列出)。具体分析如下。

1) 农户政治身份作为异质性来源。在10%显著性水平下, 政治身份的交互项方向为负, 说明有一定政治身份的农户更倾向于参与资本下乡合作。这类农户通常能够更加及时地获取政策信息, 并且信任国家政策。他们理解引入外部资源对村庄发展的重要性。部分村干部甚至通过加强与经济能人的

联系, 争取项目资源, 从而巩固其在村庄的影响力和权威。

2) 农户风险偏好作为异质性来源。在1%显著性水平下, 风险偏好的交互项方向为正, 说明风险偏好较高的农户更倾向于通过与工商资本合作来改善生产经营模式。相反, 风险偏好较低的农户更倾向于维持现有生产模式, 以避免潜在风险。这种行为可以视为“避险行为”, 即低风险偏好的农户选择避免变动, 而高风险偏好的农户则更愿意追求利润最大化。

3) 家庭农业劳动力比率作为异质性来源。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且其系数为负, 表明家庭中参与农业生产的成员越少, 农户与工商资本合作的意愿越强。家庭农业劳动力比率的下降意味着家庭务工人员比率的上升。当家庭的主要劳动力以外出务工为主时, 劳动力的稀缺性使得农户更期望通过其他资源的补充来增强家庭的韧性。当前国内面临就业岗位不足、就业渠道受限等严峻问题, 若能够与工商资本合作, 拓展农业农村的就业空间, 使农户在不离开家乡的情况下保障家庭生活, 这将为农户提供一个有效的“回流”选择。

4) 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作为异质性来源。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且系数为负, 表明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为农业经营收入的农户更倾向于与工商资本合作。而当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为转移性收入时, 农户则更倾向于维持现状, 不愿做出改变。根据实际调研情况, 以非农就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户家庭通常不愿再投入精力参与工商资本下乡。而对于那

表5 带交叉项的混合Logit分析结果

Table 5 Mixed Logit analysis results with cross terms

变量类型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随机参数变量	替代常数 ASC	2.900	2.398	2.234***	0.036
	能人返乡	0.875***	0.174	1.136***	0.280
	务工参与	0.515**	0.263	2.232***	0.402
	入股分红	-0.223	0.314	2.829***	0.521
	合同契约	-0.949***	0.250	1.081***	0.388
固定参数变量	公司+合作社+农户	-0.421***	0.148		
	公司+村集体+农户	0.373*	0.201		
	信息公开	0.085	0.184		
	纠纷调解	0.021	0.173		
交互项	政治身份×ASC	-1.039*	0.586		
	风险偏好×ASC	0.450***	0.091		
	农业劳动力比率×ASC	-1.471**	0.645		
	家庭主要收入来源×ASC	-0.666**	0.279		
LR chi2(5)			160.93***		
Log likelihood			-850.952		
有效数据条数			3 048		

些主要收入来源仍为农业经营的农户而言,农业生产是他们的“铁饭碗”。企业提供的稳定销售渠道、技术支持、培训和短期就业机会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因此,这部分农户通常也是企业下乡合作的主要对象。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论

1) 农户并不排斥与工商资本合作,尤其是当企业老板为本地人时,能为农户带来更高效用;当村集体充当组织者或担保者时,农户更愿意合作,而合作社未能提供农户所需的“安全感”或更高效用。在利益联结机制的选择上,农户更倾向于在企业务工,其次是随行就市,签订合同契约未能改善农户的效用。与传统认知相悖的是,农户对合作过程中的服务保障似乎并不敏感。

2) 在异质性检验中,具有一定政治身份和较高风险偏好的农户更愿意参与资本下乡的合作。此外,家庭中参与农业生产的成员较少,或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为农业经营收入的农户也更倾向于与资本合作。因此,农民群体的信息获取能力、市场意识以及家庭结构深刻影响着农户对资本的接纳程度。

4.2 政策建议

1) 工商资本应采取有效的策略。例如,积极参与村庄的红白喜事、民主议事等,融入乡村独特的社会关系网络;或主动承担部分村庄社会责任及公共物品的供给,例如在产业园区建设时,拓宽村内产业道路,改善电路、水路等基础设施。在生产建设过程中,需注重农村社区生态环境的保护,积极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在推动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加关注社会效益。

2) 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多方鼓励外出能人回乡投资兴业。第一,创造出良好的返乡投资环境,为企业提供税收减免、贷款贴息、创业补贴等财政优惠政策,减轻投资成本压力;第二,开设创业培训班,提升返乡能人的专业技能,提供农产品市场营销、财务法律等实用课程;第三,增强返乡企业家社会认同感,定期举办“优秀返乡企业家”评选活动,表彰优秀能人,利用媒体宣介返乡企业家的成功案例,发挥企业家重乡情、乐奉献的优势。

3) 在推行资本下乡时,必须更加重视农民在决策中的主体地位。一方面,可完善农民参与的决策机制,通过村民大会、村民代表会议等形式,鼓励村民参与村集体的决策过程,确保农民在项目规划、实施和监督等环节中有发言权,确保资本下乡

项目符合农民的实际需求和长远利益;另一方面,完善协商机制,定期召开由企业和农户共同参与的会议,讨论项目进展、问题及解决方案;还可利用村民微信群等线上沟通渠道,避免矛盾激化。要实现这两种机制,必须强化村集体组织的地位和功能,提升其治理能力和对外来资本的谈判能力,政府等上级部门可灵活设计政策,给予村集体一定的自主权。

在经济社会日益发展的今天,农民在乡村拥有更多发展机会和权利,国家政策动员与基层招商引资带来了新的契机,资本下乡也应作出适应性改变,与农民建立更良性互动关系。由于农户的个人风险承受能力、地位身份等差异,他们在面对企业下乡经营时,在机会把握、资源占有等方面也会有所不同。因此,要不断完善联家带农机制,探索建立复合型利益联结机制,以满足农民收入来源多样化和风险分散化的需求,此外,企业在利用村庄资源时,应承担起一定的发展和保护村庄的责任,让更多的人共享资本下乡的红利,真正发挥资本的强大功能。

参考文献:

- [1] 徐勇. 现代国家乡土社会与制度建构 [M]. 北京: 中国物资出版社, 2009.
XU Y. Modern country, local society and system construction[M]. Beijing: China Materials Publishing House, 2009.
- [2] 曾博. 乡村振兴视域下工商资本投资农业合作机制研究 [J]. 东岳论丛, 2018, 39(6): 149-156.
ZENG B. Study on the cooperation mechanism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apital investment in agri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J]. Dongyue Tribune, 2018, 39(6): 149-156.
- [3] 韩朝华. 个体农户和农业规模化经营: 家庭农场理论评述 [J]. 经济研究, 2017, 52(7): 184-199.
HAN C H. Individual farmers and scale farming: reviews of the theoretics of the family farm[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7, 52(7): 184-199.
- [4] 何宇鹏, 武舜臣. 连接就是赋能: 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的实践与思考 [J]. 中国农村经济, 2019(6): 28-37.
HE Y P, WU S C. Connection as empowerment: the practices of linking small-scale farm households with modern agriculture in China and their implications[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9(6): 28-37.
- [5] 贺雪峰. 为什么要维持小农业生产结构 [J]. 贵州社会科学, 2009(9): 4-9.
HE X F. Reasons to keep the structure of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production[J]. Guizhou Social Sciences, 2009(9): 4-9.
- [6] 徐宗阳. 资本下乡的社会基础: 基于华北地区一个公司型农场的经验研究 [J]. 社会学研究, 2016, 31(5): 63-87, 243.
XU Z Y. The social context of capital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a case study of agriculture enterprise in northern China[J]. Sociological Studies, 2016, 31(5): 63-87, 243.
- [7] 穆娜娜, 孔祥智. 工商资本下乡种粮的增收机制: 基于案例的

- 实证分析[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7, 38(01): 23-30.
- MU N N, KONG X Z. The revenue growth mechanism of grain production by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apitals: a case study of Anhui, Shandong and Hebei Provinces[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17, 38(01): 23-30.
- [8] 陈义媛. 资本下乡: 农业中的隐蔽雇佣关系与资本积累[J]. 开放时代, 2016(5): 92-112, 8.
- CHEN Y Y. Capital going to countryside, hidden wage labor relationship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agriculture[J]. Open Times, 2016(5): 92-112, 8.
- [9] OBIDZINSKI K, DERMAWAN A, ANDRIANTO A, et al. The timber legality verification system and the voluntary partnership agreement (VPA) in Indonesia: challenges for the small-scale forestry sector[J]. 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 2014, 48: 24-32.
- [10] 高嘉祺, 薛彩霞.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路径与实践剖析: 来自西安市21个村落的调研[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0, 41(4): 628-636.
- GAO J Q, XUE C X. Analysis of the reform path and practice of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 system: based on the survey of 21 villages in Xi'an[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20, 41(4): 628-636.
- [11] 曲海燕, 张斌, 王真. 村企合作助力乡村振兴的典型模式与风险防范[J]. 改革, 2023(6): 95-104.
- QU H Y, ZHANG B, WANG Z. Typical models and risk aversion of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villages and enterprises in rural revitalization[J]. Reform, 2023(6): 95-104.
- [12] 李海金, 刘凤萍. 资本嵌入、村社自主与乡村产业发展的实践路径: 基于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多案例比较分析[J]. 求实, 2024(5): 83-95, 112.
- LI H J, LIU F P. Capital embedding, village autonomy and practical paths of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 multi-cas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rural area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J]. Truth Seeking, 2024(5): 83-95, 112.
- [13] 周浪. 另一种“资本下乡”: 电商资本嵌入乡村社会的过程与机制[J]. 中国农村经济, 2020(12): 35-55.
- ZHOU L. Another kind of “capital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E-commerce capital embedded in the rural society[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20(12): 35-55.
- [14] 雒珊. 作为平台的村庄: 资本下乡“经营村庄”及其后果[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40(4): 114-127.
- LUO S. Villages as platforms: capital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managing villages” and its consequences[J].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23, 40(4): 114-127.
- [15] 曾维和. 当代西方“整体政府”改革: 组织创新及方法[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16(5): 20-27.
- ZENG W H. Contemporary “whole of government” reform in the west: organization innovation and method[J]. Journal of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08, 16(5): 20-27.
- [16] 吕童. 网格化治理结构优化路径探讨: 以结构功能主义为视角[J]. 北京社会科学, 2021(4): 106-115.
- LÜ T. Discussion on the optimization path of grid governance stru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J]. Social Sciences of Beijing, 2021(4): 106-115.
- [17] LANCASTER K J. A new approach to consumer theor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6, 74(2): 132-157.
- [18] MCFADDEN D. The measurement of urban travel demand[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74, 3(4): 303-328.
- [19] 张童朝, 颜廷武, 何可, 等. 资本禀赋对农户绿色生产投资意愿的影响: 以秸秆还田为例[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7, 27(8): 78-89.
- ZHANG T C, YAN T W, HE K, et al. Impact of capital endowment on peasants' willingness to invest in green production: taking crop straw returning to the field as an example[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7, 27(8): 78-89.
- [20] 叶飞, 王吉璞. 产出不确定条件下“公司+农户”型订单农业供应链协商模型研究[J]. 运筹与管理, 2017, 26(7): 82-91.
- YE F, WANG J P. Negotiation model for “company + farmer” contract farming supply chain under random yield environment[J]. Operations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Science, 2017, 26(7): 82-91.
- [21] 许恒周, 郭忠兴. 农村土地流转影响因素的理论及实证研究: 基于农民阶层分化与产权偏好的视角[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 21(3): 94-98.
- XU H Z, GUO Z X. Theoretic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influential factors of rural land transfer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hierarchy differentiation and property rights preference[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1, 21(3): 94-98.
- [22] 望超凡. 村社主导: 资本下乡推动农村产业振兴的实践路径[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1(3): 28-36.
- WANG F C. Village community leading: the organizational path of capital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to promote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J]. Journal of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1, 21(3): 28-36.
- [23] 贾亚娟, 赵敏娟. 纳入农户偏好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研究: 基于选择实验法的实证分析[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1(6): 91-103.
- JIA Y J, ZHAO M J. Research of the rural domestic waste classified treatment based on the preference of farmer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hoice experiments[J]. 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1, 21(6): 91-103.
- [24] 陈雨生, 朱玉东, 张琳. 农户环保型农资选择行为研究? 基于实验经济学[J]. 农业经济问题, 2016, 37(8): 33-40, 110-111.
- CHEN Y S, ZHU Y D, ZHANG L.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agricultural materials choice of household based on the experimental economics[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6, 37(8): 33-40, 110-111.
- [25] 朋文欢, 黄祖辉. 契约安排、农户选择偏好及其实证: 基于选择实验法的研究[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 47(4): 143-158.
- PENG W H, HUANG Z H. Contractual arrangements, choice preferences and empirical researches for smallholders: a study based on choice experiment[J].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7, 47(4): 143-158.
- [26] 俞振宁, 谭永忠, 茅铭芝, 等. 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式休耕补偿政策: 农户选择实验及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18(2): 109-125.
- YU Z N, TAN Y Z, MAO M Z, et al. The subsidy policies on

- fallow of farmland contaminated with heavy metals: a farmers' choice experiment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analysis[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8(2): 109-125.
- [27] 孙博, 段伟, 丁慧敏, 等. 基于选择实验法的湿地保护区农户生态补偿偏好分析: 以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为例[J]. *资源科学*, 2017, 39(9): 1792-1800.
- SUN B, DUAN W, DING H M, et al. Preference analysis of househol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n Crested Ibis protected area in Hanzhong, Shaanxi based on choice experiments[J]. *Resources Science*, 2017, 39(9): 1792-1800.
- [28] 韩喜艳, 刘伟, 高志峰. 小农户参与农业全产业链的选择偏好及其异质性来源: 基于选择实验法的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 2020(2): 81-99.
- HAN X Y, LIU W, GAO Z F. Selection Preference and preference heterogeneity of Smallholders' participation in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chain: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choice experiment method[J]. *China Rural Survey*, 2020(2): 81-99.
- [29] 赵晓峰, 包智俊, 赵祥云. 资本下乡的经营策略与农业强国建设[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4(4): 45-53.
- ZHAO X F, BAO Z J, ZHAO X Y. The management strategy of capital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gricultural power[J]. *Journal of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4, 24(4): 45-53.
- [30] 林宣佐, 陈希. 龙头企业参与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利益联结模式及风险防范[J]. *学术交流*, 2020(1): 131-139.
- LIN X Z, CHEN X. Interest connection and risk prevention of leading enterprises' participating in the progress of rural three industries integration[J]. *Academic Exchange*, 2020(1): 131-139.
- [31] KUHFIELD W F, TOBIAS R D, GARRATT M. Efficient experimental design with marketing research applications[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94, 31(4): 545-557.
- [32] 李景刚, 高艳梅, 臧俊梅. 农户风险意识对土地流转决策行为的影响[J]. *农业技术经济*, 2014(11): 21-30.
- LI J G, GAO Y M, ZANG J M. The impact of risk awareness on farmer's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of land transfer[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14(11): 21-30.
- [33] 刘丹, 巩前文. 农户异质性风险偏好对耕地休耕决策行为的影响[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0, 41(3): 502-510.
- LIU D, GONG Q W. The impacts of risk preference heterogeneity of farmers on their fallowing decision behaviors[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20, 41(3): 502-510.
- [34] HENSHER D A, GREENE W H. The Mixed Logit model: the state of practice[J]. *Transportation*, 2003, 30: 133-176.
- [35] 熊春文, 陈家碧. 青年农民返乡村居的生计体系及其社会基础: 基于对华北一个村庄的案例研究[J]. *青年研究*, 2023(1): 45-57, 95.
- XIONG C W, CHEN J B. The livelihood system regarding the young peasants' returning to the countryside and its social foundation[J]. *Youth Studies*, 2023(1): 45-57, 95.
- [36] 罗玉峰, 邓衡山, 陈菲菲, 等.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户参与: 自选择还是被参与[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7, 38(1): 103-110.
- LUO Y F, DENG H S, CHEN F F, et al.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cooperatives: voluntary or compulsory[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17, 38(1): 103-110.
- [37] BELLEMARE M F. Agricultural extension and imperfect supervision in contract farming: evidence from Madagascar[J].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0, 41(6): 507-517.
- [38] SCHIPMANN C, QAIM M. Supply chain differentiation, contract agriculture, and farmers' marketing preferences: the case of sweet pepper in Thailand[J]. *Food Policy*, 2011, 36(5): 667-677.

(责任编辑: 孟岑)